

潜在写作文丛

青春的绝响

Qingchun de juexiang

陈思和/主编 蔡华俊等/著

被掩埋的青春记忆和被压抑的都市风情，
见证着历史的荒凉与丰富，写着革命之外的
另类诗意。浪漫、抒情、感伤、唯美……

WUHAN
PUBLISHING
HOUSE

潜在写
作文从

青春的绝响

Qingchun de juexiang

责任编辑 李杏华
装帧设计 刘福珊

ISBN 7-5430-3194-9



9 787543 031944 >

定价：65.00元

潜在写作文丛

青春的绝响

Qingchun de Juexiang

陈思和/主编

蔡华俊 陈建华
丁证霖 郭建勇
钱玉林 王汉梁
许基鹤 张 焯
周启贵 著
李润霞 编选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
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的绝响/蔡华俊等著;李润霞编选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6.1

(潜在写作文丛/陈思和主编)

I. 青… II. ①蔡…②李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8335 号

著 者:蔡华俊等

丛书主编:陈思和

编 选:李润霞

责任编辑:李杏华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督 印:方 雷 朱有茹 戴 涌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 85497614(读者服务部)

印 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40.25 字 数:800 千字 插 页:2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3000 册

ISBN 7-5430-3194-9

定 价:6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“椅长而又长，上面只铺满了残叶”。许基鹤
摄于1970年



1967年，陈建华（左二）与诗友钱玉林（左一）、朱育琳（右一）等摄于上海长风公园。

总序

Zong xu

总序

陈思和

一

有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她想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的抽屉是空的》。她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优秀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，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，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，放在自己的抽屉里，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。——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。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那位朋友的想法，她把那种写出来准备放在抽屉里的文学作品称之为“抽屉文学”，我则称它们为“潜在写作”。两者意思有点相似，就是指那些写出来却没有及时发表的作品。如果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定义，也就是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。但这两个定义还都有补充的必要：就作品而言，潜在写作虽然当时没有发表，但在若干年以后是已经发表了，如果是始终没有发表的东西，那





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；就作家而言，是以创作的时候即不考虑发表，或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写作的为限，如有些作品本来是为了发表而创作，只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故而没有发表的（如“文革”的爆发迫使许多进行中的写作不得不中断），这也不属于潜在写作的范围。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完成是一个互为证明的写作过程，我之所以称之为潜在写作，是因为这个词比起“某某文学”（如抽屉文学等）的命名更加强调了写作这一活动对文学的意义。


其实，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缺乏潜在写作。这类写作含有多种意思，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，如书信、日记、读书眉批与札记、思想随笔等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。作者写作的最初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，其“潜在”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文学创作，却具有某种潜在性的文学因素，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，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，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的被认可和被欣赏。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，或抒情言志，或虚构叙事，但由于某种原因作家在当时不可能发表这类创作，也就是我的朋友所说的放在抽屉里的，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公开发表。对这类作品，过去文学史作者也曾注意到，但一般情况下是将这类作品放在它们公开发表的时代背景下讨论，这对于写作者本人是无关紧要的，可是一旦置于文学史背景中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提出“潜在创作”现象就是把这些作品还原到它们的创作年代来考察，尽管没有公开发表，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，但它们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，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。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。在任何一个时代里，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，统治者的思想永远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，所以，研究者只有将被遮蔽在地底下的民间思想文化充分发掘

出来,才能够打破“万马齐喑”的假象,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和多元性。文学史著作研究潜在写作现象,也同样以还原某些特殊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目的。

另外,潜在写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多种类型可作进一步的讨论,比如对某种通过非正式发表渠道来传播的创作,如某些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词,当时虽然没有发表,可是在朋友熟人中间互相流传,直到诗人去世后才公开出版,那算不算潜在创作? 还有,由于中国出版制度的特殊性,有些不是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,但通过民间编刊物或自费印刷的方式问世的文学作品,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,但直到若干年以后才陆续被正式出版物所刊登或转载,这样的创作算潜在写作还是公开写作? 这些现象比较复杂,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界定。

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,完全是出于编写当代文学史的需要。近十多年,我一直思考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,也相应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。潜在写作的问题正是其中之一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其他各种原因,使许多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可能性,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写作的努力,在各种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渴望,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,并开拓出一个丰富的潜在写作的空间。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,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属于过去时代的文本,放到时过境迁的新的环境下,很难显现出它们原有的魅力,新时代有新的情绪与感情需要表达,所以,这些作品很快被更具有时代敏感性的话题所掩盖。但是,如果还原到这些作品酝酿和形成的年代的背景下来阅读和理解它们,并将之与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相比较,其热辣辣的艺术感染力就马上凸现出来。过去编写的文学史著作,





均以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时代的代表作,而一般被忽视和被否定的作品很难写进文学史,更不要说没有公开发表的潜在写作。从表面上看这样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没有什么大错,因为在一个精神生活浮躁嚣张的时代里,其代表性的作品只能是浮躁嚣张的作品。但是如果深入一步把潜在写作的现象考虑进去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那个时代里仍然有作家在严肃地思考和写作。不过作家们身处不同的社会处境,他们思考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些被时代的喧嚣之声所淹没的声音,恰恰具有可贵的个人性和独立性。如果把潜在写作纳入文学史的视野,那么,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的内容会非常丰富和精彩。

根据这样的想法,我于1999年撰写了《我们的抽屉——试论当代文学史(1949—1976)的潜在写作》一文,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杂志上,并且根据潜在写作的理论视角去重新整合当代文学史,由我主编的复旦版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直接体现了这一探索性的实践。潜在写作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,围绕了这一问题有李扬、李润霞、王光东、刘志荣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探讨,证明了它具有不断完善、不断修正、不断充实的理论生命力。尤其是刘志荣先生最近完成的近四十万字的《潜在写作:1949—1976》专著,这个问题在文学史理论创新意义上得以比较全面的论述。

市来,我以为潜在写作的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例。但最近阅读了前苏联女作家莉季娅·丘科夫斯卡娅的《阿赫玛托娃札记》,这个观念有所变化。莉季娅留下的文学创作很少,但留下大量的书信和日记。《阿赫玛托娃札记》三卷本是她的代表作,她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为忘年交。阿氏在最困难时期也不放弃创作诗歌,她的大量诗歌都是潜在写作的产物,通过秘密的背诵保存下来。而莉季娅就是参

与保存这些不朽诗歌的秘密背诵者之一。她与阿氏有深厚的友谊也有矛盾冲突,甚至一度绝交。但从1938年到1965年,她几乎是编年式地记录了她与阿氏的交往、交谈和交流文学见解的内容,保留了阿氏的大量诗歌。据说她对阿氏诗歌的创作情况比诗人本人还了解。从阿赫玛托娃、莉季娅等人的创作和文学实践来看,前苏联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的现象更为酷烈,令人可歌可泣。索尔仁尼琴^①的回忆录里有《地下作家》一节,也记载了自己在流放中的潜在写作:“我(在狱中)摆脱了无谓的幻想。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: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,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;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,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。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,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。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,有的写于劳改营,有的写于流放中,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:开始写诗,后来写剧本,最后又写散文作品。我只有一个希望: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,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了我自己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——有几万行之多。为此我想像着诗的格律音步,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。劳改期届满时,我相信记忆的力量,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,后来竟能写下并记住整个一篇散文。记忆力还真不坏!进展顺利。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来的东西重复一遍,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。”这种靠记忆来保存潜在写作的形式是最为经典的形式,中国诗人胡风、绿原、曾卓等在狱中创作大量诗词也正是同样的方法保存下来的。

要了解我们的抽屉里究竟还有什么,目前还难以列出详细的清



^① 索尔仁尼琴《牛轭顶橡树》，陈淑贤等译，群众出版社2000年，第5页。

6



单。潜在写作是一片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,许多遮掩在传统文学史观念与话语之下的作家作品正在逐步被重视,许多发表了的作品意义正在被重新认识,研究潜在写作的过程也正是开掘这一项课题的过程,因此许多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。目前我们所整理出版的《潜在写作文丛》只是一个努力的开端,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学术实践和探索,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来加入这件有意义的工作,共同来开发和分享这一领域中被长期遮蔽的丰富与丰硕的果实。

编者序：亦诗亦史 ——关于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选

李润霞

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选包括《暗夜의举火者》(上卷)、《青春的绝响》(中卷)、《被放逐的诗神》(下卷),是“潜在写作文丛”中关于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歌选集。关于本诗选所涉“潜在写作”的内容意义、研究方法以及编选体例和原则,本序将一一作出说明。

一、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潜在诗歌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政治地震把诗坛分裂成两个部分:主流诗坛与地下诗坛,“文革”诗坛呈现出双向平行、对峙共存的格局。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和时代或多或少都会存在,“文革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,并且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格局。与公开的文学相比,湮没在地下的文学潜流往往“是当时文学的异质力量,但又最富于生命力,后来成为‘文革’后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。”^①当潜隐的文学浮出地表之后,便以其自身存在的“非常”与“非凡”构筑了曾经被视为荒原般的“文革”文学,而“文革”文学因这“另一半”的出土也由单一变得丰富复杂,同时为新时期出现的文学激流找到了一种源头。

^① 洪子诚: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版,第206页。





“文革”中的潜在诗歌是指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未公开发表(出版)的,与公开诗坛中的主流诗歌相对峙的、共时性存在、非共时性地进入文学史,并产生文学影响的“另类”文学创作。这些诗歌是因为诗歌创作者迫于某种原因而被迫转入“地下”的潜在写作,亦可被称为潜在诗歌,他们在诗歌的创作观念、艺术特征、审美旨趣、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相迥异的艺术特色,所以在当时甚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被淹没、被遗忘的潜流状态。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歌正是以与主流诗歌以及时代风尚相迥异的“异质性”与“异端性”才更体现出它可贵的价值。

从地域角度来看,北京、上海和贵州等地的潜在诗歌比较有代表性,都具有较长的时间延续性,而且具有一定的群落性质,从不同程度上对“文革”到新时期的诗歌酝酿与崛起起了某种推动作用。从年龄角度来看,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是“文革”时期潜在诗歌的两股主要创作力量,他们的创作不仅是“文革”中潜在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且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——即“归来的诗”与“朦胧诗”。可以说,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歌是新时期“归来的诗”与“朦胧诗”的主要源头与潜流状态,他们共同推进并构筑了新时期的诗歌地基。事实上,“归来的诗”与“朦胧诗”中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作正是创作于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诗歌。需要注意的是,年龄与地域的划分也并非互不关联的,在某些时候或涉及到具体作家、作品时,它们之间也有交叉。另外,对老诗人与青年诗人按“事后性”的不同流向来分别进行论述,只在具体对象、具体时期中适用,并不具有一般意义,而仅仅在本文所给定的“前朦胧诗”与“归来前的诗”这两个具体指称中具有实际内涵。因为年龄并不是划分诗潮、流派的唯一因素,只表明他们在特定时期、具体创作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创作境遇、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

精神质素。

老一代诗人在“文革”时期的诗歌创作构成了潜在诗歌的一部分。称之为老诗人，基于两个原因：一方面因为他们在“文革”时基本上都步入了人生的中老年；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“文革”前甚至建国前已经开始诗歌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，有许多还曾是著名诗人。如绿原、牛汉、曾卓等“七月派诗人”，穆旦、唐湜等后来被追认命名的“九叶诗人”，以及20世纪50—60年代即成就诗名的郭小川、蔡其矫、流沙河等。另外如黄永玉、陈明远以及并非诗人的无名氏等也在“文革”的压抑中拿起诗笔冲破时代的禁锢，抒发人性之声。这些诗人后来常被归入“归来者诗群”，相应地，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创作可被视为“归来前”的诗歌。^①这部分的诗歌已经收入潜在写作文丛中的其他选集中，本丛书重点收入青年一代诗人的作品，因而没有选入他们的作品，也不再详述。

青年一代诗人是“文革”时期潜在诗歌创作的一支生力军，不论在数量，还是在质量上他们的创作都更具实力，成就更高，也更有代表性。“文革”时期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山西、贵州、福建、河北、四川等散落于全国各地的青年（主要是城市青年）重新思考时代人生并开始诗歌写作，如食指（郭路生）、哑默、北岛、顾城、舒婷、杨炼、陈建华、钱玉林、周伦佑等。根据现有资料，他们中少数人的创作甚至在“文革”前已经开始，如郭路生、陈建华等。其中在知青插队的所在地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诗歌群落，如“白洋淀诗群”，它是“文革”期间比较典型的知青诗歌群。另外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形成了小范围的文学聚会、文艺沙龙，他们

① 实际上，“归来者诗群”在新时期发表的不少代表各自诗歌成就的作品都是他们在“文革”时期的潜在写作。本文参考谢冕、唐晓渡主编《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》等著对“归来者诗群”的归类。





谈诗论艺,进行诗歌写作,按照诗人的地域归属并结合其创作成就,大致以北京、贵州、上海三地形成“文革”时期潜在诗歌创作的代表性诗人群。目前,对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史料挖掘较为丰富,引起较多关注,而其他地域的诗群则相对处于整体或局部被湮没的状态。

在共和国文学史上,这种特殊的潜在的文学创作,其形成有着一一定的历史原因。按理说,他们的文学聚会或文学沙龙在当时是不可能存在的,但青年人正处在“精神断乳”但思想活跃的阶段,他们开始思考人生,开始关注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,并且青年人的创造激情与政治激情之间一旦遇合,他们的诗歌写作也以各种隐秘的方式延续、保存下来。他们是那个时代里的早醒者,为了这份诗与思的早醒,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在文学专制的“文革”时代,写诗本身成了一种冒险的行为,而宣称要“触及灵魂”的这场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确真正触及了一代人灵魂的深处,使他们得以觉醒。

青年诗人有两种情况,一类是出生于建国前的 20 世纪 40 年代前半期,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,从一进入新社会就成了时代的弃儿或边缘人,有些甚至是被歧视、被专政的对象。“文革”时他们已经成年,思想相对较为成熟,没有经过从狂热向失望明显过渡的精神蜕变。而且他们中不少人没有经历过“上山下乡”,而是留在了城市(或市郊),且在“文革”之前或“文革”初期完成了高中学业,并通过各种办法有了工作。如哑默 1963 年高中毕业,1964 年起在贵阳市郊区野鸭塘小学任代课教师。陈建华 1967 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第三港务工程局船舶修理厂当工人,直到 1979 年考入复旦大学。钱玉林 1967 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,1974 年春开始在上海红光中学任语文教师,直至 1980 年夏。张桦 1966 年高中毕业后因病在家待业,1974 年被分配在街道文化系统工

作,直到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。另一类是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或50年代初期(集中在1948—1954年)的城市青年,常被称为“共和国的同龄人”,他们“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”,其中一部分作为“老三届”^①在“文革”中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,或者进入工厂当了工人;或者参军当了兵(包括复员转业再当工人),如田晓青(“文革”期间先当兵后当工人);或在农村插队或是插队后再当兵或回城当工人,如食指(1968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,1970年秋回山东老家鱼台县务农,1971年2月—1973年2月在山东济宁参军入伍),舒婷(1969—1972年在闽西山地区插队,1973—1981年回厦门当工人),杨炼(1974年在北京昌平插队),马佳(1969—1975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)等。他们中大多数人经历了“上山下乡”,经历了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变,在转变中也由所寄身的时代完成了他们的“成人仪式”。最为典型的是在河北白洋淀插队形成的知青诗人群落“白洋淀诗群”,包括根子、芒克、多多、林莽、方含、宋海泉等。尽管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的他们在“文革”时期的生存经历有所不同,但时代语境和思想历程其实有很多相似性和相通性,理想与激情的失落与追寻,对个人前途的渺茫感,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、苦闷感,成为其中最强烈、最真实的情绪,而“知识青年”或“待业青年”这些特殊而尴尬的身份标签与背后的难堪命运就是他们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所换取的“赏赐”和代价。

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,能够看出他们这代人在特殊环境中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滋养,不管是残存的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,还是各种“灰皮书”、“黄皮书”,在“文革”时期的地下读书活动

① “老三届”指“文革”期间在校的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届中学生,他们大多出生于1947—1952年,到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时,平均年龄为14—19岁左右,是1968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主体。

